

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參考資料

(第四輯)

目 錄

論生存·····	方然(一)
更向前·····	舒蕪(七)
什麼是人生戰鬥·····	舒蕪(九)
「呼吸」一期小結·····	編者(三)
論改造·····	黎衆(三)
文化風貌錄·····	方然(三)
「呼吸」二期小結·····	編者(四)
「主觀」與真實·····	方然(五)
希望·····	舒蕪(五)
求友與尋仇·····	舒蕪(六)
論溫情·····	舒蕪(七)
論文藝創作底幾個基本問題·····	余林(七)
對目前文藝現象的一些看法·····	胡笳(九)

向生活觀視·····	舒燕 (一〇四)
空談及其他·····	孔翔 (一〇八)
論「飄飄然」·····	舒燕 (一一六)
再論求友與尋仇·····	舒燕 (一二六)
論小資產階級·····	懷潮 (一三〇)

論生存

方然

「呵天爺爺，生活不教人安靜，到處都撥弄人！」

——奧勃洛摩夫

周逆作人說道：「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的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

「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當然不足道，人爲萬物之靈，當然應該「微妙地，美地生活」。但終究怎樣「微妙」呢？曰：「半個隱士，半個叛徒。」

因此，生存也並不很難。中國，「半」是極多的；「隱士」，「叛徒」也極容易作。

而「半個隱士，半個叛徒」確爲生存之「微妙」法則。

可以「叛」的時候，就叛，可以「隱」的時候，就隱；在叛的時候，帶着隱的因，隱的時候，帶着叛的果；在「叛徒」前面是隱士，在隱士前面他是「叛徒」；叛與隱適可而止，叛與隱互爲體用。

爲誰而叛？爲誰而隱？曰：主子。

沒有找到好主子，或者沒有找到主子「好」，於是就「叛」；在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主子，找到「好」，於是「隱」。

「我的朋友」之類××君，前些時自重慶榮歸，一見面，笑過之後就感慨曰：「這次回來，看到朋友們不外兩種變化：第一種，以前不行，而現在大爲進步；第二種，以前還好，現在也沒有什麼進步。這就是落伍了。」言下，自己似乎是屬於「不斷革命」之類。這似乎「叛」得很可以了。於是摸出名片：「採訪主任」！又聽說「主任」曾帶了東西跪在一個女人面前：「你答不答應？不答應，我就自殺！」革命尚未成功，當然不能自殺。於是女士答應。有名片，有女士，很可以「隱」了吧，而臨行之時，又訓我曰：「這年頭，老兄，人要打江山的，瘋頭瘋腦是不行的！」於是，又是「叛」，不斷革命。

據說有些「詩人」是既有「熱情」而又「驕傲」的。一位女詩人寫信道：「我太不行了。因爲我太不驕傲！」這大概因爲「女」的關係吧！特別謙虛。而「熱情」「驕傲」確爲「詩人」主要「氣質」。例如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馬」就感動了許多男少女。幾乎每一行有一個「花」字，「熱情」可想而知。軍長又特別賞識，騎在大白馬上，照理說應該拉一位佳人，放在馬背上，一道「隱」去，或者「叛」得更有味；但是佳人也居然「驕傲」，居然不答應。於是「詩人」眉毛一揚：「算完蛋了。老子去了！」於是，「驕傲」終歸於詩人。又有一位「詩人」向人宣稱：「不管把我放到什麼地方：我是不會墮落的！」這股子熱，似乎也屬不斷革命之類。但有詩贈其愛人曰：「我是一顆炸彈，將爲你爆炸！」云云，手提炸彈示之以威，這是「詩人」之「驕傲」。若果一炸成功，則可以「隱」矣，或者「叛」得更有味。

叛法之妙，隱法之微，舉不勝舉。列其名於抗議之書，回其頭於座談之會。一付進步臉，兩條關係腿，對高畫符，對低說教；用最卑劣之方法取別人之「愛」，裝點自己之「清」；用別人的血來發自己的熱，還要嫌別人血不熱；像煞有介事的走來，若無其事的走去……

以前常聽說「生存圈」，現在常聽說「據點」，是的，生存是必須要有圈子，要有據點的。

「史記」：「田單列傳」，記載這位齊國名將保存「據點」的方法：引誘敵人來割掉齊國兵的鼻子，來挖掉齊國人的墳，這樣激怒齊兵的士氣，於是打了勝仗。此法之妙，無待詳言。

奧勃洛摩夫在他的「據點」之上，活到脂肪塞破了血管。其保全據點的方法，就是：「關於過去的無效的哀憤，和燃燒似的良好心體實，針似的刺着他，他竭力要擺脫這些體實的重荷，要找另外一個人來歸咎，而將這針刺轉向他。」而奧勃洛摩夫是可愛的，奧爾迦愛他，房東太太愛他，斯托爾茲愛他，說他的心好。他儼然是個人道主義者，他曾教訓了一位「作家」：「思想是愛所孕育的，伸出一支手去扶起墮落的人來，或者在他身上流淚。」

因此，就有了「奧勃洛摩夫主義」：挾了算盤，挾了書本，挾了愛人，挾了「革命的武器」，爲了獲取「永久的保證，然後避向安靜與休息。」

一片血海中，據點是必要的，在那上面完成精神統治領域。

譬如，儘管相信自己作的是「進步的工作」，便可以躊躇滿志於「據點」之中，而相信「天下烏鴉一般黑」論，而且統治着妻子，不準她唱歌，不準她「空想」，不準她多望外面。譬如，一位「批評」家受朋友之託，監視朋友妻子的貞操，忙得很，而且還爲一隻湯匙的價格，要同太太吵一夜。這些，可以想到：在據點之上，修牆補漏，爲了「保證」也是不容易的。

至於大家默認「方向」相同，用各式各樣資本，求各式各樣的淵源，把姚雪垠的名字刻成核桃那末大，把施蛰存的信印作封面。也是不容易的。

據點是要「保」的，圈子是要結的。保結之法，就是成都名人兼學者姜蘊剛教授所提倡的「友

情主義」。甚麼是「友情主義」？姜先生曾舉例曰：「有塊石頭，我要搬，搬不動；遠遠看見有人來了，於是跑去同他講友情，於是他就跑過來了，於是石頭搬成了。」石頭是討厭的，兩人搬，這是「大的方向相同」，就發生更大的力量，搬去給他們墊足吧，但不知搬來了甚麼。姜教授又有「新野蠻主義」，這大概是指搬的精神而言，「友情」之前，與「友情」之後的不擇手段之類。於是姜先生的弟子歌頌春天，歌頌「生命力」云云。

你好，我好，大家好！

3

杜林先生曰：「真的，在一切時代，在一切法律狀態之下，時形人均被排除，可是從平常人到畸形人，到幾乎失去人形的人之間，還有許多階層的梯子。如果採取辦法，來預防醜惡的人的現出，那麼這顯然是有利之事。」（「反杜林論」）

這是保證平安，保證生存的重要原則。

「打落水狗」，惹起譁然，恐怕至今還是未息；「披頭散髮的戰起來」（兩地書）也絕對要被目為不成體統，不顧環境。

常有人自比為「園丁」，這也是的確。拿起「理性」與「中庸」的大剪刀，剪去一切杈杈桄桄，被「現實」的泥巴壓住，在「黎明」的空氣里成長。長得「如實」（用羅克汀語，見「萌芽」創刊號）。

據說有「小我」，有「大我」；小我存於「大我」之中云云。大至無外，小至無內，內外融洽，矛盾統一。前有「真理」，後有「人民」，無往而不可，縱有小不可，總有大可。生存之樂，即在於此。

有小說家而兼青年教授者，一面走，一面捶着腰：「還說『青年作家』哩，腰就痛了，人家托爾斯泰到八十歲……蘇聯的作家那麼舒服！」有「青年」可愛，有「托爾斯泰」可比，有蘇聯可想。這

也許是杜林先生所說的「許多階層的梯子」甚麼的。

虛偽的微溫，胆怯的利己，蠕動的人道。

膠體狀態的生存；遇熱像要溶解似的，遇冷像要凝固似的，遇到了物，像被激蕩而馬上黏住，這就是它的「感性存在」；順應地，黏住一點氣霧，一片原理，一條公式，一滴眼淚，一聲呼喊，一個良心。但隨即攪成一片，無改於膠體狀態。

生存，文藝就是這樣。

虛偽，無恥，惡毒，瘋狂。

我們的時代的生存！

生存，生命底否定，真實的生命否定過程。虛偽的生命否定過程。

一位朋友說：「不是死拖，就是活闖。」然而虛偽的生命是不死的，因為有的是屍，隨便拖一個過來，就可以借屍還魂。

借了袁世凱的屍，借了張之洞的屍，借了袁子才的屍，借了希姆萊的屍……也借了魯迅的屍。

某部長已經說明白了：中國害了病，如果「內服藥」不靈，那就要開刀了。開刀；好吧，偉大的醫生，「內服藥」也的確「服」得太多了，血管要漲破了，請抽出 *Made in America* 的雪亮的刀，插向中國的心臟吧！殺死一切真實的靈魂，留下一片屍首，你們要的是屍首，讓你腐臭的靈魂，在上面還魂，完成你們的「民意」的王國！

謝冰瑩在成都，講演又教書，告訴青年「文藝創作」；寫文章說道：「聽到可愛的青年們的熱情的聲音，使我心又熱烈起來，我又想從軍了。」云云。我從前「從軍」，這是「生活」；「我現在又

想從軍了」，這是「熱情」。「生活」加「熱情」乃成「文學家」。而拿津貼，努力毒害青年們的「熱情」，使變成獸一樣的屍首，然後她又在那上面「熱烈起來」了。

而且還有以拜命自命的「詩人」，有以「中國的德萊賽」自稱的小說家，驕傲他們的「美麗」的辭句，多情的「憂鬱」。在少女幻想的屍體上還魂的巧妙。

活着，爲着死得容易；死了又可以還魂。

中國歷史的真實：唯生論。

(原載「呼吸」創刊號)

更向前

舒 燕

說「方向」

人會戰鬥，會進步，但也很容易的就會妥協，就會落後。這是因爲，妥協往往有戰鬥的外形，而落後又往往有進步的幻象。

曾經戰鬥過來，進步過來的人，心甘情願的妥協，心甘情願的落後，是不多的。他的妥協與落後，通常都是在他自以爲的戰鬥與進步之中萌生，在他自以爲的戰鬥與進步之中成長。這裏，就顯現出社會生活的強力。

社會生活並非平面的，而是總由某種日漸凸起的東西和某種日漸消蝕的東西，錯綜交雜的構成爲立體，凝聚爲洪濤的，凸起和消蝕有差別，凸起之處的微凹和消蝕之處的微隆，也應該有差別，也應該就是天與地山與澤那樣的差別。「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我們的詭辯學派的祖先，當說出這句話時，無非仍然是詭辯。然而，直到我們，還是容易被這詭辯所迷惑。我們常常是，已經墮入深澤之中，却看着自己的身體的高度而得意，以爲還比世界都高；更常常是，在竭力攀援之後，剛把頭顱伸出於地平線，就自以爲「頂天立地」了。

譬如今天，寫白話文，已經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但如果落到一個「尊孔讀經」的深澤中而還能寫白話文，就自以爲了不起，自以爲大的戰鬥與遠的進步了。這時，就只要「寫白話文」，而不管

「文」里面是些什麼；無論「文」里面是怎樣妥協與落後的東西，都自以爲戰鬥與進步。

其實，今天，在廣大深遠的社會生活中，不但「寫白話文」算不得戰鬥與進步，就連「信仰抗壓主義」也可以是妥協與落後，並且可以是反動。

然而，竟還有人，在今天這樣的時候，一看到一個「信仰抗壓主義」的人，就「推心置腹」，就原有他的一切惡劣與卑污。對於他的這一切惡劣與卑污，看是看到了的。然而還給以原宥；反對是也反對的，然而也還是給以原宥；問其原因，則說是「大的方向相同」，云云。

方向，是運動的產物，是運動的對象。苟無運動，又「方」些什麼？「向」些什麼？抗壓主義是具體的，所以也就是運動的。惟其具體，故沒有什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空洞一般的「大的方向」；惟其運動，故即使有那樣的「大的方向」，當運動都不存在的時候，它也不能存在。

抗壓主義對於它的信仰者所要求的，曾經很簡單的，只是「信仰」；現在却複雜得多，是「吸收」。兩個名詞，似同實異：前者蓋僅關涉於理念，思想，了解，後者却需要動員全部的生活，人格，精神。這就是說，今天的戰鬥與進步的方向，必需是在實生活的全領域內，鑄鑄整個的人格與精神於所信仰的對象之中，鑄鑄所信仰的對象於整個的人格與精神之中，以此新編的精髓之軍去佔領生活的全領域，去進行這種佔領。這就是說，將在信仰之中用主觀精神之火來燃燒生活，用生活之火來燃燒主觀精神，在信仰之中生起這種烈焰。而總生，就是要把客觀的歷史任務化爲主觀的生活要求，把戰鬥的進行與進步的發動當作生命的發展的必要前提，而反對那一切躺在「歷史任務」的懷里而洋洋自得的市儈主義，以及那一切吊在「歷史任務」的尾上而瞻前顧後的中庸主義。

要說「大的方向」，這才是今天這樣的社會生活里的「大的方向」。在今天，只有以這爲「大的方向」的人，才有真實的運動，才是真實的戰友；而那些不以這爲「大的方向」，却把什麼「信仰抗

「謬主義」之類當作「大的方向」，當作招牌挂在身上蕩來蕩去，藉以招搖撞騙的人們，極客氣的說，也是「非友人」。

當然，反市儈主義的人，反中庸主義的人，身上也未必沒有市儈的中庸的因素吧！但因為他有真實的運動，真實的「大的方向」，是在真實的日益迫近於這「大的方向」；那麼，這里，倒正可以說一句「大的方向相同」。

當然，即使在今天，能「信仰」抗謬主義，也還是不很容易的吧！當不許你「信仰」它的那種勢力，還威壓着整個社會生活的時候，對於能「信仰」它的人，的確也難免給以同情，認為「大的方向相同」吧！這種同情，這種「認為」，原來也正是戰鬥的倫理學與論理學，無可非議。但是，戰鬥時，決不能立足於和敵人相同的水平之上。我們戰鬥，別無武器，只有社會生活中遠較敵人為高的水平，才是我們的武器。五四以後不久，封建勢力還不許人寫白話文時，先進的反封建戰士們已經運用白話文更進步的武器來反封建了。即如魯迅先生，在文言文勢力還很大的北京，就並不因為「現代派」中諸人所寫的是白話文而引為「大的方向相同」，而還是要與之死戰。在今天，社會生活的最高水平，已經不在於對抗謬主義的「信仰」，而在於對它的「吸收」，我們就必需爭取這個更高的「吸收」；倘被敵人拖回到信仰的低水平之上去，那就無異容忍了市儈主義與中庸主義，那就正是形似戰鬥的妥協，幻作進步的落後了。

對市儈主義與中庸主義的容忍，如前所說，其實只是外部的表現。至其所表現的內容，則就是：已經落到封建貴族的法西斯主義的深澤之中（其中充滿了市儈與中庸的污水），剛把頭顱伸出抗謬主義的地平線之上，全身却還是浸在市儈與中庸的污水裏面，就自以為「頂天立地」……這也就是如此。

那麼，究竟怎樣自拔呢？在現實的行動上，就是首先把「大的方向相同」的判斷，從那些掛着招牌的市儈主義者中庸主義者們那裏收回；對於他們，即使最客氣，也認定爲「非友人」。

今天，人們都要求生活里的實踐了。這種割棄，即使不是實踐本身，大抵也是它的發端吧！

辭「理想」

抗戰八年，一切比個人更高更大的存在，例如民族，祖國，歷史，人民，都在最感性的形式上顯現出來了。它迫使人們不得不感到它，不得不被它吸引。它把人們造成爲理想主義者。

千千萬萬的理想主義者，都是爲了民族，祖國，歷史，人民，而存在，而活動的。但又有一點分別：其中的大部份是，主觀上和客觀上都確乎這麼存在，這麼活動着；而還有一小部份，却只是主觀上這樣自信，客觀上却未必然。

前一部份人，於是淪落，飄零，饑餓，死亡，自然也還有在堅持奮鬥；而後一部份人，直到既已「最後勝利」的今天，算一筆總賬看，却大抵混得很好，很得意。

現在，我不想對於前一部份人說一句話：我要說的是後一部分人。

我看，他們是有許多方便的：——

第一，他們既是「爲了」那些大目標而存在，他們的存在也就籠罩於那榮光之中，許多缺點都可以隱藏起來了。即使藏得不好，被人家發現，他們也有充份的權利要求原諒。——啊呀呀！你看我是「爲了」什麼而存在的？你還這麼吹毛求疵麼？

第二，他們既是「爲了」那些大目標而活動的，而「爲目的不擇手段」又是古之明訓，於是卑污

苟賤，爭名奪利，無所顧忌，無所不爲。敢有指斥我的麼？我是「爲了」那麼大的目標的，你這就是反對我的目標，就是反進步，就是反革命。

第三，他們的存在與活動已經是「爲了」大目標而犧牲的了，於是，他們就有權利要求別人爲他們犧牲，這就等於爲他們的大目標犧牲。你不願意麼？你這個自私的東西，你這個利己主義者！好吧！隨你去，你看，千秋自有公論！

他們滿口說着「明天」呀，「人類」呀，「信仰」呀，這些非人世所有的非人類的話語。他們就憑着這些而要求原諒，要求退讓，要求犧牲。

他們是把民族人民之類並不當作民族人民，而當作豪家主子，當作後台靠山。他們就憑着這而狐假虎威，就倚勢橫行，就放賴撒嬌。

他們把信仰和理想當作制服和勳章，用來威嚇鄉愚，矜其妻子。他們把信仰和理想當作「白玉霜」和「斯丹康」，用來獻媚爭寵，搔首弄姿。

他們想到自己的「爲了」，就偉大起來，有力起來。正如納粹黨徒想到「我們的元首」，日本軍人想到「天皇陛下」，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想到「我們在天上的父」一樣。

因此，我想，不要再說什麼「爲了」吧！我不相信這些漂亮的名目，崇高的話語，我認爲那在現在，在我所在的這裏，都是非人世所有的非人類的東西。我認爲，一切這類的東西，用處都無非是要求原諒退讓和犧牲，都無非是喝血的管子，割肉的刀子，祇要是從他們口中說出的。

說「爲了」什麼的，其實什麼也不爲，祇爲了他們自己。聽他們說而相信了，而要去「爲了」什麼的，結果也是什麼都「爲」不了，祇拿自己「爲了」他們。這尤其是大可悲哀，也可憤怒的事。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抗暴力以暴力，予打擊以打擊；因此，對於只爲自己的人，也把一切都收起，祇留給他們以自私。——在仇恨的道德，戰鬥的道德上，就是這樣。

而且，即使不說什麼仇恨或戰鬥，自私也未必都是惡德。

例如革命，當然總有舍己從人，天君泰然，鋼鐵似的英雄吧，但要我輩凡人去革命，我就得首先想想，自己是否不革命時就生不下去，活不下去？倘並不如此，我決不去替人哭喪；倘確實如此，我才去。這雖然祇是爲了自己，沒有爲了人民爲了歷史那樣好聽，而且爲了自己也算不得什麼「爲了」，然而，我不相信替人哭喪會於革命有益，而爲了自己的革命究竟也還是革命。所以，在這種情形下，自私是必要的。

再如救人，倘請我當麻瘋院的醫師，祇要我會，我當然欣然應命；但若我自己身上就患了麻瘋，那麼祇好敬請另覓高明，我先要躲起來醫治自己。這當然也沒有奮不顧身，置身度外之類的美譽，但我恐怕醫不好別人，又更傳染給別人。所以，在這種情形下，自私也是必要的。

這樣自私下去，沒有皈依於一個更大更高的存在，或者會如黑格爾所說，要成爲最不自由最沒有人的價值的野蠻民族吧？那些深奧的歷史哲學我不十分懂。然而，我也不必和黑格爾辯論，我且也「學院式」的來說幾句表明自己的意見的話；我說：更高更大的存在誠然必要，但個人與它的結合却必須是平等的關係，或者還必須是超於它之上，把它包羅入自己的內心，使由自己的內心發動，而不能作它的奴才。而且，看黑格爾那樣的戰鬥精神，他的本意也未必是要人作什麼「絕對精神」的奴才的。

連所謂更高更大的存在，都要把它包羅入自己的內心，這當然也是自私，更是自私。但這自私顯然並不容易做到，還得很費些力氣。而在力竭氣喘之中，再要滿口說着那些漂亮的話語，當然是即使

心願也做不到。即使做到也只是疲勞發熱中的昏話罷了。

總之、老實說，理想主義何嘗不好？但要看所謂「理想」也者如何解釋。倘那就是一種身外的香花，足以掩蓋身上的惡臭，我是不想做什麼「理想主義者」的。我倒寧願首先盡力消除自己身上的惡臭，這樣的來「利己」，來做一個自私主義者。而且，凡有和我同樣的這麼盡力於「利己」的，我也願意結爲朋友。

然而，倘有人說，那不是什麼「利己」，却是一種較近較小的理想。那麼，便又也可以是「理想主義者」了，我當然何樂而不爲，或者說，何苦而不爲。

但又總之，在今天——今天，我祇見到我所見到的「理想主義者」諸公一排排高坐在上面時，我是決不想擠上去的。

一九四五，八，三十一，汗雨齋。

逃 「集 體」

考茨基分析個人主義的社會根源時，說個人主義乃是適合於知識份子的情緒的東西，而不是適合於勞動人民的情緒的東西。因爲，知識份子的價值，完全在於個人的學識，個人的才能，個人的品質；而這些東西，越是在個人的孤獨中才越能顯現，越能凸出，越能發出作用。至於勞動人民，在孤獨的個人的存在上是完全沒有力量的；只在結爲集體時，只在每個人都確實感到自己是集體中之一份子時，才有大的力量，既有力從事於創造與建設，也有力從事於破壞與鬥爭。這個分析，是爲伊里奇所深深贊許，並且引用到他的名著「進一步退兩步」中去的。

由此可見，凡有志於前進的知識份子，就必須掙脫他所愛好的孤獨，投向他所嫌惡的集體。由此可見，凡有志於前進的知識份子，就必須不把自己的價值寄託在個人的學識才能與品質之上，而認識那更大更高更現實的集體力量，把自己的價值寄託在上面。

這都幾乎已經是「老生常談」，沒有什麼問題的了。

然而，中國是一向「國情不同」，這回也是「國情不同」。

在中國，在這抗戰的八年，知識份子們多半在集體之中了。但這集體是怎樣的集體？這是，這是知識份子「們」。

在中國，在這抗戰的八年，知識份子們多半寄託自己的價值於一種比個人更大更高更現實的力量之上了。但這力量是怎樣的力量？這是，這是許多個人的學識才能與品質的相加，許多個人的學識才能與品質的加法的總和。

在這樣的「集體」之中，在這樣的「集體力量」之下，知識份子們是不是也有了比在孤獨中更大的力量呢？是的，有了的，他們覺得是有了的。他們是不是也能強毅的從事於創造與建設，破壞與鬥爭呢？也是的，也能夠的，他們也覺得能夠的。他們既這樣覺得，當然沒有法子，於是，侏儒幻爲巨人，懦夫儼如勇士。而抗戰八年中，知識份子的所謂「進步」，也就大抵如是，大抵如是。

看事實吧。列如什麼「界」什麼「界」之類，從名稱上，就表現了裏面聚着同夥，外面隔開異類，固若金湯，清如涇渭的模樣。在那裏面的每個人，當然都能感到聲氣相通，呼吸相屬，山鳴谷應，一唱百和的幸福與權勢。有事發動時，既已如此，而當無事時，走來走去，目所見者皆同道之容，耳所聞者皆同道之聲，口所談者皆同道之事，心所想者皆同道之理，於是，自然也就覺得據點鞏固，國土無疆，前途無限光明，敵人已潮死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歡欣鼓舞之何從了。至於